

《三大队》的跨媒介改编留下哪些遗憾？

桂琳



在剧版和影版《三大队》中分别饰演男主角的秦昊(上)和张译(右)



2008年，非虚构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上线，不仅激起网友的大量讨论，更是被“万人血书求拍电影”，从而成为各大影视公司争相抢购的大IP。由此我们才能看到近期影版与剧版《三大队》几乎同时面世，而且两个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又都十分强大的盛况。

但从观看效果来说，影版整体质量过硬，但仍然有些平淡；剧版高开低走，属于比较失败的魔改。可以说，两个版本都没能将原作故事的跨媒介改编潜力完全挖掘出来。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难得的影视改编IP

《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被各大影视公司青睐，首先源自故事蕴含着难得的悲壮之美。

罪犯没有全部归案，办案的三大队却被解散，办案人员还面临牢狱之灾，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悲剧性。故事中蕴含的漫长时间更是加剧了悲剧感。一个案件12年才被侦破，办案的刑侦队长坐了8年牢，出狱后又过了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只为追寻凶手。但这个悲剧故事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并不是悲惨，而是悲壮。虽然悲惨和悲壮都涉及悲伤和痛苦，但悲惨只能让人感受到悲哀和绝望，悲壮则是一种崇高的情感表达，它通常涉及到英勇、壮烈或庄严的情境。这种情感能够激发人的内在生命力量，使人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角程兵不向命运屈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对正义的信仰显然更接近悲壮之美。这也是整个故事的灵魂，让读者深深感动和共鸣之所在。文学和影视史上表现悲壮之美的佳作数不胜数，而且都能产生强烈的观众感召力。这个原作故事中的悲壮之美如果表现得力，就会成就出新的优秀作品。

其次，这个故事的非虚构性和故事梗概特征对跨媒介改编极为有利。

原作作为非虚构故事，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扎实可信，为改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著名作家路遥曾说过，故事作家可以自己编，但生活却不能编。对创作者来说，“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

越大”。这个故事的非虚构性可以说就为后来的跨媒介改编提供了最宝贵的生活。而且整个故事时间跨度将近12年，但故事原作却只有9000多字，可以说仅仅提供了一个故事内容梗概。与很多小说改编影视剧相比，文字媒介所带来的文学性对跨媒介改编的影响非常小，这就使得无论影版还是剧版，反都能够充分发掘出各自的媒介优势来大展身手。

略显平淡的影版《三大队》

影版《三大队》整体结构非常严谨，这也是它质量保证的基础。作品总时长125分钟，严格按照建制、复杂情节、发展情节和高潮四幕结构编写剧本。建制部分为电影前40分钟，交代了探案，谋杀嫌疑人，入狱到出狱，情节紧凑。复杂情节部分以20分钟在情感上着力，将程兵出狱后见队友、祭拜师傅，到最终决定继续追踪二勇的心路历程作为表达重点，让观众与他之间的情感纽带建立起来。

发展部分通常是所有剧作的重点部分，要展现主要人物如何一步步解决问题。影版这个部分持续50分钟。到了高潮部分，程兵最终协助警察抓住了二勇，影片以一种惆怅的情绪结束全片，让观众充满了感慨。

而影版最终的呈现略为平淡，主要问题是出在第三部分，即发展情节上。原作中程兵的打工地点集中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这一方面与逃犯是四川籍有关，另外逃犯在这些多山和欠发达地区也容易躲藏。如果沿用原作的地点作为影版的选择，不仅十分合情合理，而且将地点集中一些也便于叙事展开。但影版却将东北、广东、西双版纳等地纷纷纳入剧本中，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占用影片时长又着墨不多，反而让电影如流水账一般平淡。

与此同时，原作中提到，逃犯在12年来也是想尽办法四处躲藏和打工。他频繁更换工作，程兵干过的工作都干过，但从不敢长做，更不敢在工作中冒头，只要稍有风声，就会果断逃窜。程兵

与逃犯甚至出现过在上一家公司，他离职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线索前往入职的那天。这种东躲西藏不仅十分符合逃犯的生存状态，而且也展示了程兵高超的侦察和追踪能力。这么好的素材，影版却弃而不用，而是让逃犯在整个追捕过程中完全不出现，没能将追凶警察与逃犯之间的“较量”充分展现出来。观众的观影乐趣由此大为减少。

实际上，现实主义与观影乐趣本来就是对立的关系。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中，电影前半段夜店桥段的性感元素、砸卖假药场桥段的狂欢元素、追逐黄毛桥段的动作元素、会见牧师桥段的喜剧元素等，这些类型愉悦元素如在现实题材上点缀着的糖豆，让观众在紧张和松弛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对《我不是药神》的最终成功功不可没。《三大队》影版的追凶过程其实也可以在类型愉悦元素上多下点功夫，将程兵和队友们与逃犯之间的斗智斗勇以更戏剧性的形式进行呈现，为整个影片吸引观众助力。

魔改失败的剧版《三大队》

相对影版来说，剧版《三大队》改编实际上难度更大一些。相对原作的故事梗概特征，影版可以在原作的主线情节下填充细节，使得整个情节发展基本忠实于原作。而剧版因为时长的原因，不仅要增加大量的追凶故事，而且还必须丰富人物形象和相互关系，几乎可以说是重新创作。

但无论如何重新创作，原作主人公身上的悲壮之美绝对应该是表达的重中之重。

从追凶故事来说，原作中的时间、地点和追捕过程都为主人公的悲壮之美服务，本身也都有严密的逻辑性，剧版首先应该充分地利用。但剧版却完全抛开了原作故事，一味追求案情发展的奇闻性。剧集从逃犯选择盗窃价值连城的玉石事件开始，就进入魔改状态，后面只能是一魔再魔。因为从逻辑上来说，一个东躲西藏的逃犯怎么可能将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作为作案目标？这样的赃物一

则不好出手，二则容易暴露自己的逃犯身份。编剧最后竟然都不知道如何安置这块玉石，干脆让它凭空消失。

从丰富人物形象和关系来看，剧版意识到需要丰富逃犯形象，但丰富并不合适。原作故事的悲壮之美只能属于主人公程兵，逃犯可以作为一个强大对手存在，不断给程兵的追捕带来困难，但绝不能对他进行人性化塑造。剧版中不仅将他过于人性化，剧集最后一集用很长篇幅让逃犯讲述自己的经历更是离谱。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剧作还让大勇母亲、侄女与程兵之间产生大量情感戏，这不仅削弱了程兵身上所携带的悲壮之美，更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反感不适。

必须承认的是，与电影相比，电视剧的创作与观看都更强调日常性，如何通过日常性展现悲壮之美，的确是对创作者的考验。其实也并非没有办法，原作中的漫长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表现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人生况味。就如2023年大火的《漫长的季节》一样，表层写案情，深层却是写时代，写生活，写小人物。但因为前文所分析的剧情和人物魔改，剧版没能如《漫长的季节》那样耐心地去挖掘时代、生活和小人物这些本来属于剧版的优势内容。原作中其实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细节都可以给剧版带来灵感，可惜偏偏被剧版创作者轻易放过。如程兵干了那么多工作，接触了那么多人，他的这些经历本身就是生活。程兵入狱前与妻子离婚，后来破案后又与前妻复婚，从此过着平静的生活，甚至拒绝接受采访。从离婚到复婚，这中间主人公又经历怎样的情感历程等等。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为电影和电视剧发挥各自媒介优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堪称优质IP。然而，跨媒介改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既要原作IP有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原作的真正魅力所在，更需要对本媒介有充分的自觉，将原作魅力与自身媒介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部真正的佳作。在IP改编日益成为影视创作显流的今天，《三大队》的跨媒介改编遗憾可以给其他创作者带来很多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鸣龙少年》窥见新时代知识观与教育想象力

林可

近期在央视八套收官的青春校园剧《鸣龙少年》，明线讲述了两位教师雷鸣(张若昀饰)和桑夏(黄尧饰)共同成立鸣龙中学11班，帮助五位学生突破学习困难和生活困境，最终考上大学的故事，其中不乏向国内外同类经典剧作致敬的元素；暗线则通过各类角色、多重视角的“小剧场”反映了社会大背景下的教育“老难题”，也触及诸多新热点，例如与日俱增的学习压力与低龄化的精神疾病、屡禁不止的校园欺凌和网络暴力、原生家庭束缚、女性身份困境、集团化办学的公平与效益平衡、选课走班制的利弊之争、课后补习的生意与公益之辩等。但是，仅靠塑造超人教师、挖掘异才学生和堆砌社会问题，并不能脱离教育类型片的既定套路。

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

如果说《鸣龙少年》存在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那就是通过叙事完整、人物自洽、拍摄扎实的主题单元，认真呈现了一些属于教育原理和哲学层面的议题，有助于启发人们溯本求源地追问教育自身的“应然使命”而非附着在社会期待之上的“实然无奈”。

何谓教育的原理问题？价值论和知识论是其中绕不开的两大类。通俗来讲，就是上学受教育有什么价值？什么样的知识是有用的？

结合剧情设置的第一层背景——高考——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显而易见：受教育的价值不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吗？高考高考，当然是考试知识最有用！

然而，如果继续考量第二层背景“新高考”，那么透过剧中师生的经历，观众就会发现，死记硬背、机械重复的知识似乎不太管用了；新高考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在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具象化表征。

接下来的第三层背景是“高中教育改革”。相关政策文件都明确指出，高中教育的新定位是要促进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适应高等教育，适应未来职业。奠定每个学生终身发展的基础。值得肯定的是，《鸣龙少年》紧跟政策铺陈相关情节，展现了改革进程中新旧教育观



电视剧《鸣龙少年》剧照

的交锋与调和。

再往下深挖，第四层背景关乎“成人教育”。这里的“成人”并非指成年后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而是讨论教育如何引导学生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大写的人和幸福的人。在剧中，学生们的家境、个性、能力、爱好、优势、弱点各不相同，让每个孩子都成人、成才、成长的因材施教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实践起来也并非易事。得益于雷鸣、桑夏两位老师的专业辅导与精准帮扶，李燃、程雨杉、江晴朗、边晓晓、禹洋和沈耀等学生都有幸成为了更好的人、过上了更有意义的生活。

什么样的知识更有用？

在新高考、新教育的格局之下，知识

的“有用”标准发生了变化吗？《鸣龙少年》就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剧情呈现了三组知识类型之间的博弈与共存。

第一组是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前者指用语言、文字、符号记录表述的、可交流传递的知识，而后者涉及非正式、情景性、难以言传的具身知识。课本知识、卷面知识是显性知识的代表，它们在塑造公共知识和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塑造了公众关于学校教育等同于背书、刷题的刻板印象。

剧中鸣龙11班成立之前，学校极其重视显性知识。随着剧情展开，缄默知识的价值也逐渐显现：雷鸣带着11班学生勇闯监控室、观察分析“桃李班”和“松柏班”优秀学生的学习状态和习惯，让他们发现好成绩冰山之下蕴藏的学习潜力秘密；被称为“鸣龙乔布斯”的李

燃虽然前期成绩落后，但总能驾轻就熟地修好各类手机和电子设备，这类民间物理学实践让他在第一次接触物理竞赛题目时就凭借直觉经验找到了另类解题思路，也让他随后的“添翼计划”中如虎添翼；在乡村长大的边晓晓对于捉虫、摸鱼等活动得心应手，绿水青山塑造了她对美好事物的观察力、敏感力和创造力，她拍视频、搞直播的“不务正业”也在老师的悉心引导下成为了艺考路线的“主业”。

第二组是工具化知识与游戏化知识。工具化的知识原本是人们从事某些专业活动时掌握流程、提高效率、增加成效的重要知识。但随着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工具化知识愈加沦为功利化知识，校内外各种速成法、神操作、刷题技巧、选课选校机经、求职就业面经等

成功学知识大行其道。

很多人会说：“这或许不是知识本来的样貌，但不掌握它们就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类似的矛盾在剧中多有讨论，雷鸣和桑夏在给学生做选课组合与生涯规划之时，也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最终，两位老师达成和解，用游戏化的知识替代了工具化知识的局限，启发学生从游戏规则、游戏方式、游戏精神等角度深度体验学习乐趣、理解人生意义。

例如：雷鸣给学生上手机戒断课，通过设置不同的活动任务，生动剖析了手机成瘾背后有关注意力争夺、控制和分配的游戏原理。在帮助学生抽离知识时，雷鸣邀请了奇葩教师各显神通，比如唱歌学英语、边讲爱情边教诗词古文、摇骰子玩抢答帮助学生厘清历史年份事件、边打太极拳边用身体动作模拟世界洋流……看到这些情节，无数观众在弹幕中感叹：“遇到如此有趣的宝藏老师，谁还能不沉迷学习呢？”

当然，即便名师加持，剧中学生的成长经历也绝非叠满Buff的开挂之旅：禹洋无数次休学、程雨杉与继父斗智斗勇，江晴朗体验说唱之后来年复读，李燃差点重蹈父亲的覆辙，而沈耀在父母婚变之后也自己选择了独立的故事线……这些情节在现实中各有各的沉重与伤痛，但在理想化的剧作中，鸣龙少年们举重若轻，把伤痛当成不断打怪升级、开启新地图副本、刷出新支线剧情的RPG游戏。可见，游戏化的知识是教育世界的一种认识论基础，有助于建构一套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也许没啥功利的好处，但至少能给予“失败”玩家重启人生的勇气。

第三组是自我关怀与共同生活的知识。细心的观众可能留意到，鸣龙中学的校训是“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它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21世纪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以及著名教育哲学家内尔·诺丁斯的关怀教育理论。类似的教育倡议致力于解决现代科技和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精神文化生产相对滞后薄弱而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及生态危机。

不论是桑老师的心理课，还是雷老师的集训班，都主打“眼中有人”的关怀

基调。老师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禀赋，帮助学生化解衣食住行危机，允许学生犯错跑后归队，倾听学生的隐秘烦恼，陪伴学生经历抑郁自残、亲人病痛、家庭变故、社会不公等磨难，在师生双方深度卷入彼此生活的过程中建立同伴信任与集体凝聚力，激发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互帮互助的社会情感能力。显然，第三类“知识”从不计入考试分数，但，得之终身受益，失之后患无穷。

国产剧如何激发教育创新的想象力？

不可否认，《鸣龙少年》回到学校教育核心场域来讲故事、提问题、找答案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在依旧强势的高考指挥棒功能下，这样的逆袭爽剧难免令人缺乏代入感。纵然每个人都希望像程雨杉和李燃那样“分数乘以三”“人生燃起来”，也期待热血教师开启另类教学试验、师生家长合力探寻教育真谛与生命意义的完满结局，但未来的国产教育类影视创作，可否有更广泛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从时间上看，每个人的一生短暂而漫长。关于高考之后学什么、考什么以及生活这场大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未必能给出答案，但教育类的影视剧创作可以发挥想象力尝试作答。在这点上，《鸣龙少年》的结局迈出了第一步，对剧中主角成年生活的模糊化处理，开始有了一些朴素而丰富的教育想象力。

从空间上看，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广阔版图之上，还有无数值得取材创作的场域。乡村学校、县域中学、职业高中、普通高校、专科学院、特殊学校的学生，他们不是“鸣龙少年”，未必不能一鸣惊人。即便现实的招考制度与社会文化惯性限制了人们的教育想象力，优秀的影视作品或许能为多样化的知识观和教育观贡献新的打开方式。

(作者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